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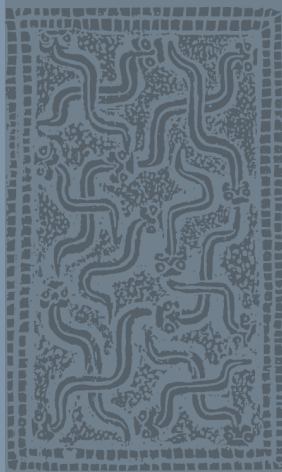
清代

「左传」

学成就研究

刘宗棠 刘迎秋 周伟玲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清代《左传》学成就研究

刘宗棠 刘迎秋 周伟玲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代《左传》学成就研究 / 刘宗棠, 刘迎秋, 周伟玲著. —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19.9
ISBN 978-7-206-16383-8

I. ①清… II. ①刘… ②刘… ③周… III. ①中国历史—春秋时代—编年体②《左传》—研究 IV. ①K225.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213360 号

清代《左传》学成就研究

著 者: 刘宗棠 刘迎秋 周伟玲

责任编辑: 郭 威 桑一平 封面设计: 尤 雷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长春市人民大街7548号 邮政编码:130022)

印 刷: 长春市昌信电脑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6 开

印 张: 15.25 字数: 242 千字

标准书号: ISBN 978-7-206-16383-8

版 次: 2019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9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中文摘要

《左传》是以丰富而翔实的史料对纪事简约的《春秋》经文进行解释的古文经典，使经文中的各种历史大事及蕴含的有关“大义”等得到史料方面的支持。作为成书于先秦的儒家最大部头的古文经书，其包含着珍贵而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以及高超的叙事技巧，所以，在今天看来，它不仅是一部经书，更是一部优秀而信实的史书和瑰丽而成熟的文学作品。

基于上述观点，本书利用文献学与计量文献学、学术史、目录学、文学理论等知识，对以考据学为本质学术特征的清代《左传》学研究成就，大体从经义解释、校勘、辑佚、史学以及文学角度进行分类研究，力图概括出各类《左传》文献成果的学术特点及其价值。既有对各类成果的历史追述，更重要的是对该类成果中的典型作品进行深层次研究、对比、分析和归纳，总结出该类文献成果的一般特点和学术价值。

以阐发《春秋》经传大义的研究成果在清初占据主流，康熙时代以官方所刊行的两部《春秋》专著为代表，力图摆脱自南宋以来一直处于官学地位的胡氏《春秋传》的权威，对其利用经文所发挥的许多不符合新朝廷道统观的论点，特别是“严华夷之辨”以及“复仇”等言论大加挞伐和剔除，力图以朱熹的理学思想和《春秋》观重新构建《春秋》经义体系，为新建立的满清王朝服务，这就是清初《春秋》学研究的主流和导向。《四库全书》所收录的该类专著，自然以朝廷的《春秋》观为标准，对那些不符合上述标准的数十部包括某些著名学者的此类专著，一概拒之门外。



由于清初的学者对宋明理学空疏学风的反思和批判，加之新朝廷对思想和学术领域的钳制，学术界治学的风气逐渐变得笃实。由顾炎武所倡导的“经学即是理学”的主张受到学术界的拥护，而其提倡的通经致用的考据学治学方法，更是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在小学各科空前发展和成熟的前提下，有清一代的学术在多种因素的推动下，康熙晚年最终迎来了考据学成熟与繁荣的时代。

用考据方法对《左传》杜注孔疏纠补的研究成果可谓丰硕和精良，该类研究成果几乎与整个清代相始终。由于有许多大学者的加入，如顾炎武、惠栋、王引之父子、焦循、沈钦韩、洪亮吉、刘文淇以及章太炎等，使自唐以来一直为学界权威的《左传》杜注孔疏，不仅在词义的训诂、名物制度的注释，甚至其义理的阐发等，在众多学者严谨考证下错漏百出而权威扫地。据统计，包括专著和札记在内的各类纠补杜注孔疏的成果约三十部。对《左传》杜注孔疏的驳斥需要很深厚的历史学、文献学、小学以及考据学等素养，所以，对杜注的驳斥的成果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了清代学术的发展水平和本质特征。

考据学鼎盛的乾嘉时期，崇尚汉学在学术界占据主流，有不少学者将研究《左传》的目光逐步转到汉代古文经学家如贾逵、服虔等人的旧注上来，于是辑佚汉代《左传》有关古文学家的旧注，成为有关学者热衷从事的学术事业。据统计，包括汉唐《左传》旧注的辑佚成果至少有五十部，其中以严蔚、臧寿恭、洪亮吉、李贻德、刘文淇、马国翰、王谟以及黄奭等为代表，而马国翰一人所辑录的汉唐《左传》旧注成果约有二十部。

随着辑佚和考证的深入，洪亮吉和刘文淇分别清晰地考证和勾勒出杜注孔疏与汉魏旧注、六朝旧疏的承袭关系。洪氏的《春秋左传诂》和刘氏的《左传旧疏考证》问世，使杜注孔疏的权威在清代最终走向终结，从而又激发了有关学者在汉人《左传》旧注的基础上重新构建《左传》新疏体系的热情，其中以李贻德的《春秋左氏传贾服注辑述》和刘文淇祖孙三代所撰写的《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为代表，后者是清代众多《左传》学研究的最重要的学术成就之一。

公羊学派因晚清时期国内外严峻的政治与军事形势的催发而复兴，公

羊学派的中坚人物刘逢禄和康有为分别运用考证方法撰写了《左氏春秋考证》和《新学伪经考》，宣称《左传》是西汉末刘歆为了帮助王莽篡权的伪作，而康有为认定所有的古文经典都是伪经，这对包括《左传》在内的有关古文经典的合法性带来严重冲击，而上述刘、康之说亦引起了学术界有关学者的激烈反击。参与反对《左传》伪作说的有关学者如廖平、章太炎、刘师培等也运用考证方法对刘逢禄和康有为著作中的各种论据和论证方法分别给予反驳。章太炎和刘师培分别搜集了大量先秦和西汉有关引用《左传》内容的史料，加之《左传》自身的有关内证，通过严谨考证，基本上否定了《左传》为伪经的论点。

当然，要研究和恢复《左传》旧注，首先要对经传文字进行校勘，这是古籍整理工作的前提。在清代，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将近二十部，并且体现出较高的考据学水平。考据经传的成果几乎贯穿于整个清代，乾嘉时期的段玉裁、王引之、阮元、朱骏声以及清代后期的俞樾、章太炎等人的校勘成果具有很高的考据水平和学术价值。通过上述学者的努力，为统一《左传》文本的工作打下了基础。

从史学角度研究《左传》的学者和研究成果更是蔚为大观，总成果约有一百部。既有对《左传》的改编，如马骥的《左传事纬》和高士奇的《左传纪事本末》，也有数量众多的对《左传》内容的专题研究成果。而后者为《左传》史学研究的大宗，不仅专业性强，而且考据严密，方法科学。

本书把清代《左传》专题研究的学术成果分为八类：《春秋》经传地理研究、经传人名与人物研究、经传世族谱系研究、经传历法研究、经传礼制研究、经传职官研究、经传名物专释和《左传》兵法研究。另外，还有数位学者投入巨大精力对《左传》内容进行分类综合研究，如顾栋高的《春秋大事表》、李惇的《左传通释》以及吴炳文的《春秋左传汇辑》等。

上述专门性研究中的历法研究需要发达的历法学专业知识和严密的考据学知识，清代天文历法科学的进步和考据学的发达，为《春秋》经传的历法研究奠定了基础，据统计，各类历法研究的考证性专著有二十部左右。《左传》地理研究成果也是盛况空前，各类地理研究专著约有二十五



部。上述《左传》内容专门性研究的成就中，除了历法、地理、礼制、人名、职官和世族谱系研究成果精良外，《左传》兵法研究和器物研究也是本书的重要一部分，尤其是李元春的《左氏兵法》专著，既有较高的文学点评价值，也有一定的兵法研究价值。

本书的第九章为总结清代《左传》文法研究成就的内容，见于著录的此类著作总数大约有二十四部，且大多集中在清代初期，绝大多数为评点《左传》行文叙事技巧的作品，当然有的作品内容也涉及美学、修辞学、语义学等方面的点评。在所能见到的此类作品中，王源、冯李骅和方苞等人的著作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另外，还有几部以诗歌和连珠的形式对《左传》有关内容进行研究的成果，便于初学者记诵，但学术价值远逊于前者。

本书的最后一章是针对各类清代《左传》学研究成就的总结，力争用简明的语言和尽量精确的数据，高度概括各类文献成果的主要学术特点及其得失，对各类《左传》学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的评价，尽量做到全面、客观和公允。

总之，清代有关学者所留下的约三百部各类《左传》学研究成果中，其所涉的研究内容是多方面的，涵盖了经学、史学、民俗学、历史地理学、文献学、兵法学、文字学、音韵学、文学、伦理学、自然科学以及文化学等诸多方面。与其他朝代相比，清代的《左传》学研究成就是巨大的，尤其是以考据学理论为指导的研究成果更是其中的精华，为后人留下了诸多值得珍惜、研究、继承和总结的文献遗产。

关键词：清代《左传》文献；分类研究；特点与评价；学术史

引言

一、《左传》学史略述

《左传》是部头最大的儒家经典，这里所说的部头最大，是指《左传》的文字在儒家所有经典中字数最多，蕴含的历史文化信息最丰富。据学术界传统观点，该书为鲁国史官兼孔子的弟子左丘明依据各诸侯国的史策旧闻，缘《春秋》经文作传而得名，与长于阐发微言大义的《公羊传》《谷梁传》两家今文经典一样，都是解释《春秋》的专著，因此三传有同源异流之说。

《公羊传》因董仲舒借鉴其他学派特别是阴阳五行等学说而改造成公羊学，符合西汉封建王朝大一统的政治需要，成为三传中的显学而立于学官。作为古文经典的《左传》只在少数学者中间研读和传承，直到西汉末才因刘歆等官僚大学者的青睐而提出立于学官，并与今文学派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到了西汉末年在王莽的支持下，《左传》与其他几部古文经典一起才被立为官学，最终取代了治学风格空疏穿凿的公羊学派。东汉古文经学大兴，研究《左传》的大学者辈出，贾逵的《春秋左传解诂》和服虔的《春秋左氏传解谊》等在《左传》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而服虔的著作曾一度被立于学官。《左传》学的真正成熟应当归功于晋代杜预，其《春秋经传集解》是在继承了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发明了《左传》解经的“五十凡”，连同其《左传》专门研究性成果《释例》一起，成为《左传》学



史上的里程碑式的著作。到了唐代,《左传》杜注连同孔疏一起成为官学。但由于杜预在学术研究水平等方面的原因,使其《集解》存在不少的疏失,而这些疏失又成为清代许多考据学家们考证和攻驳的对象,而且成就斐然可观。

对《左传》内容的专门研究,杜预也有筌路蓝缕之功,其《释例》中的《春秋长历》《春秋土地名》和《春秋世族谱》开创了从纯史学角度研究《左传》内容的先例。到了宋代,该类著作涉及的内容范围更广,成果也更丰硕,并且进入了文学领域。清代考据学大盛,这类研究成就无论是数量和质量都超越了以前的任何一个时代。

代明而兴的清王朝,是中国社会最后的同时也是一个由少数民族所建立的封建王朝。由于多种因素的推动,中国学术史也由宋明理学时代进入了考据学时代。在此大学术背景下的《左传》学研究成果,自然也鲜明地呈现出考据学色彩。本书的撰写目的就是以多个角度、多个层次,运用多学科知识对清人所留下的约三百部《左传》学文献成果进行分析和研究、对比与归类、总结与评价,力图尽可能客观地反映清代各类《左传》文献的学术特点和学术价值。

二、学界对清代《左传》研究的成就的得失

对《左传》清代研究成就的评价,先贤和现当代的有关著作中也曾涉及,如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皮锡瑞的《经学通论》《经学历史》,以及张立文等所撰的《中国学术通史(清代卷)》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无论是从通史还是从断代史的角度对《左传》进行综合研究的成果并不多,目前所能见到的且较有权威的著作分别是沈玉成、刘宁的《春秋左传学史稿》和赵伯雄的《春秋学史》。另外,见于著录的有关《左传》学方面的学位和学术论文,有李卫军的硕士论文《两汉〈左传〉学发微》、王晓敏的硕士论文《唐代〈左传〉学研究》以及曲辉的硕士论文《宋代春秋学研究——以孙复程颐胡安国朱熹为中心》,而对清代这段以考据学为学术大背景下的《左传》成就研究目前还没有见到,所以这是本书撰写的

初衷。由于沈玉成、刘宁和赵伯雄的研究着眼于《左传》和三传通史的研究，虽然也涉及了清代《左传》学研究的大体成就及其主要特点，对主要学者及其成果也给予了简明的分析和评价，但无论是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均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尽善尽美，这也是本书撰写的主要目的。

三、本书所涉及的研究内容与创新

本书运用文献学、计量文献学、学术史、目录学、校勘学以及文学理论等专业知识对所能掌握的整个清代《左传》学文献成果按照其内容进行分析 and 归类，综合了传统学术史和现代学科科学的分类研究方法，把主体部分分成十章：清代《左传》研究概述、清代《左传》经义研究、对《左传》杜注孔疏的补正和追本溯源、对《左传》旧注义疏的重建、晚清由今文学派挑起的《左传》伪作说的辨争、对《左传》经传的校勘成就、对《左传》经传汉魏古注的辑佚成就、《左传》史学派研究成果、从文学角度研究《左传》的成就、对清代《左传》学研究成果的总结。其中，将《左传》史学研究成果的专门研究细化为八个子目，增加了前人所没涉及的兵法研究和器物宫室类，也算是本书的一个学术亮点。另外，本书专辟一章分析和研究清代二十多部《左传》文法研究专著，总结该类点评著作的学术价值及其得失，这既是本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本书的又一个亮点。

总之，对整个清代《左传》文献的细化分类，有利于从更微观的层面上研究和把握某类文献成果的学术特点和学术价值，从而也可以补充前人在《左传》学通史研究方面的不足，便于学术界对清代《左传》文献成果有一个多角度、多层次和更全面而清晰的认识。

四、本书的选题确定

本书的选题是在导师的指导下，同时又受到了邓声国的博士论文《清代〈仪礼〉文献研究》、陈其泰的《清代公羊学》以及陈国安的学术论文



《清代诗经学研究综述》等启发，对目前所能见到的清人《左传》文献研究成果认真分析的基础上确定的。由于某些学者的作品版本稀少，所以，本书只能在现有的《左传》文献材料基础上，尽量使研究过程和研究结论做到全面和客观。由于笔者才疏学浅，时间紧迫，存在不足和疏漏在所难免。笔者愿真诚接受有关《左传》学研究前辈和学者的批评和指导意见，以便得到进一步完善。

五、研究方法 with 意义

本书运用有关学科知识，在借鉴前人有关研究成就的基础上，既要注意清代各时期官方政治文化政策对学术研究的影响，也要根据有关标准对《左传》文献加以细化分类和研究，还要对其中的主要人物以及成果进行专门研究和评价，以及对所涉及的某类专门研究成果进行简略的追本溯源，做到《左传》文献统计与分类相结合，著者生平与其著作的研究与学术背景相结合，个案研究与同类著作的整体研究相结合，从而力图再现清代《左传》学研究成就的总体学术面貌及其特征，同时也尽量客观简明地评价出各类《左传》文献流派的学术特点和学术价值。



第二节	对杜注义理纠驳的成果	(056)
第三节	对杜注于汉魏旧注承袭的追本溯源	(059)
第四节	对《正义》承袭六朝旧疏的追本溯源	(064)
第四章	清代对《左传》旧注义疏的重建	(067)
第一节	以贾、服《左传》旧注为基础的新义疏的构建	(068)
第二节	以汉魏旧注为主体的《左传》新义疏的构建	(072)
第五章	晚清由今文学派挑起的《左传》性质及其真伪的 辨争	(078)
第一节	今文经学的复兴与《左传》伪作说的缘起	(078)
第二节	《左传》伪作说派的中坚人物及其研究成果	(079)
第三节	反对《左传》刘歆伪作说的主要人物与考证成果	(093)
第六章	清代对《左传》经传的校勘成就	(107)
第一节	《春秋》经传的校勘成果简述	(107)
第二节	对《春秋》经文的校勘和考证	(108)
第三节	对《左传》文字的校勘与考证	(117)
第七章	清代对《左传》经传汉魏古注的辑佚	(132)
第八章	清代《左传》史学研究成果	(140)
第一节	《左传》史学研究成果简述	(140)
第二节	把《左传》由编年体改编为纪事本末体的主要学者和专著	(141)
第三节	对《左传》本身内容专门研究的主要学者和专著	(147)
第四节	对《左传》内容的综合研究	(184)

第九章 清代从文学角度研究《左传》的学者与专著	
.....	(193)
第一节 清人《左传》文法研究主要成果述略	(193)
第二节 《左传》文法研究成果分类评述	(196)
第十章 对清代《左传》研究成就的总结	(212)
第一节 对清代《左传》经义研究成就的总结	(212)
第二节 清代《左传》史学研究成果总结	(217)
第三节 清代《左传》文法研究总结	(221)
结 束 语	(223)
主要参考文献	(224)

第一章 清代《左传》研究概述

第一节 清代前期《左传》研究概况

传统经学的研究历来强调学术史与社会发展史应相互结合来综合考察，将著者及其研究成就置于其所生活的时代背景中加以讨论和研究，对清代《左传》成就研究亦是如此。按照学术界的一般观点，清代的学术史分为三个阶段，即清代前期、中期和晚期。清代前期是指顺治至康熙两个朝代，有的学者将雍正朝代也包括在内；清代中期是指乾嘉时代，学术界多数人主张应把雍正朝代包括在内，因为考据学在康熙晚年就基本上已经成熟；清代晚期指道光以下至清朝灭亡。

清代前期《左传》研究的学术环境之形成和研究成果的取得，是在清初学术界反思和批判导致明朝灭亡的心性理学的学术思潮的大背景下，以及在清廷学术文化领域中的政治高压下取得的，因而《春秋》及《左传》学研究的成果也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清初《春秋》经传研究仍带有宋人治学的色彩，考据学派虽然已经由顾炎武、阎若璩、胡渭和毛奇龄等大学者提倡和践行，但还没有形成学术主流，因此这个阶段的《春秋》经传研究的成果以阐发经义为大宗，同时从史学的角度对《左传》自身内容研究的学者和成果比前代明显增加。仅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以及《续修四库全书》所著录的确定为清初的《春秋》和《左传》学文献成果约九十七部，其中约百分之六十三的研究专著为推求和阐发《春秋》经文



大义为主。有部分成果则以《左传》为宗，来解释《春秋》经文有关事件始末及褒贬大义，当然也有几部以《左传》内容为主阐发其中的纲常大义的著作。从史学、文学以及校勘等角度研究《左传》的成果数量约为三十六部，大约占总成果数的百分之三十七。

清代前期《左传》的研究成果大致分为四类：一类是把《左传》作为《春秋》经文的诠释史料的学术著作，即为解释《春秋》经文的褒贬大义提供史料佐证的学术著作；一类是对杜注孔疏进行规过补充的学术成果；一类是从史学的角度对《左传》内容进行改编的学术著作，也有对其内容进行专门或综合研究的学术成果；一类是对《左传》叙事手法以及遣词造句等进行点评或研究的治学成果。由清初顾炎武等人所提倡的通经致用的考据学方法，因诸多因素的作用而被学术界继承并发扬光大，将之运用于《左传》研究中来，产生了许多学术价值很高的《左传》学研究成果。

一、以《左传》为史料佐证来阐发《春秋》经义的通论性专著

清代前期《春秋》学研究的主流，仍然延续着宋明阐发《春秋》经义和发挥政治伦理纲常的治学老路。但因清王朝把程朱理学作为国家最高统治思想，朱熹的《春秋》观自然也一同受到推崇。所以，作为代表新王朝《春秋》“新义”的《钦定春秋传说汇纂》和《日讲春秋解义》都有意识地贬低胡传的正统地位，尤其是力图淡化和清除其激于时势所阐发的，具有强烈民族情绪和意识的“攘夷”与“复仇”等《春秋》大义，力图重建一套所谓折中三传及众说、公允通达、议论平实且符合新王朝统治口味和程朱理学思想标准的《春秋》经义体系。这两部官书为清初的《春秋》学研究定下了基调。凡是从义理出发研究《春秋》的学者，多以朱熹的《春秋》和《左传》观为准则，以平易允当相矜尚，对胡传大加挞伐，如毛奇龄的《春秋毛氏传》、徐廷垣的《春秋管窥》、焦袁熹的《春秋阙如编》等均受到四库馆臣的表彰。何其伟的《春秋胡诤》和张自超《春秋宗朱辨义》可谓旗帜鲜明地与官方步调一致。在民间，《春秋》学研究的学者中，

俞汝言的《春秋平义》最符合清廷口味。该书继承明朝张岐然《春秋五传平文》治学思想，驳胡传的刻深之议论，反对抛弃三传以及穿凿附会的治学作风，尤其他的“传经之失不在于浅而在于深，《春秋》为甚”的论点，受到了清朝官方的首肯^①。

二、从史学角度研究《左传》的主要学者和学术专著

这类著作最早可以追溯到杜预的《春秋长历》《春秋世族谱》以及《春秋土地名》。自唐代以后，此类著作逐渐增多，如唐五代时期的冯继先撰有《春秋名号归一图》，宋人张大亨撰有《春秋五礼例宗》、王当撰有《春秋列国诸臣传》、程公说撰有《春秋分记》，都是从史学角度研究《春秋》经传的代表作。清代前期的《春秋》学专著主要由阐发《春秋》大义逐渐转变到《左传》自身内容研究上来，这是因为绝大多数的学者把《春秋》经传当成史书来对待，而且在当时朝廷严酷的文化学术的高压氛围下，学者不便于利用《春秋》经传发挥讽时讥世的言论，再加上考据学日盛一日和朝廷“稽古右文”的文化政策的鼓励，再者《左传》本身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仍很多，只有弄通这些专门性的学问，才能更好地理解《春秋》经传内容及其大义。这一时期对《左传》内容专门性研究的主要成果，有明朝遗民学术大师王夫之的《春秋稗疏》，主要考证经传中地理性问题，涉及《春秋》大义的内容很少。高士奇的《春秋地名考略》广泛征引其他史料，用以考证和解释《春秋》经传中的有关地理问题。另外，沈淑《春秋左传分国土地名》《左传列国职官》和《左传器物宫室》，也属于此类专门性研究成果。这个时期将《左传》改编成纪事本末体、分国纪事本末体、志表体和综合研究《左传》内容的某些专著的确有很高的史学和考据学价值，如马骥的《左传事纬》、曹基的《左氏条贯》、顾栋高的《春秋大事表》等，都是此类著作中的代表。尤其是毛奇龄的《春秋属辞比事记》一书，根据有关礼制标准把《左传》内容分成二十二门类，条理

^①（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二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